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题 目 6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

环境与党的经济发展战略

作 者 程 重 阳

专 业 中 共 党 史

1991年6月7日

所 在 单 位

(本校生填教研室)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指导教师或推荐 张天荣 副教授

人 姓 名、职 称 林蕴辉 教授

学 习 期 限 三 年

一、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与“赶超战略”

(一) 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

- 1、两大阵营的对待与斗争
- 2、美苏与中国的关系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及“赶超战略”的提出

- 1、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与抢时间建设
- 2、“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 3、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

(三) “赶超战略”述评

- 1、“赶超战略”的目标、重点及措施
- 2、“赶超战略”的得失及其原因分析

二、6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备战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 60年代的国际环境

- 1、动荡、分化与改组时期
- 2、中国周边环境的状况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分析与判断

- 1、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 2、世界革命即将来临

(三) 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战略述评

1、 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及战略措施

2、 成就、问题及其决策分析

三、70年代、8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一) 国际环境的新特点

1、 世界政治多极化

2、 世界经济国际化

3、 美苏实力的均衡

4、 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新认识

1、 党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2、 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 党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1、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2、 我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特点

结束语

一、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与“赶超战略”

(一) 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

- 1、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
- 2、美苏与中国的关系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及“赶超战略”的提出

- 1、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与抢时间建设
- 2、“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 3、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与独立自主搞建设

(三) “赶超战略”述评

- 1、“赶超战略”的目标、重点及措施
- 2、“赶超战略”的得失及其原因分析

二、6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备战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 60年代的国际环境

- 1、动荡、分化与改组时期
- 2、中国周边环境的状况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分析与判断

- 1、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 2、世界革命即将来临

(三) 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战略述评

1、 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重点及战略措施

2、 成就、问题及其决策分析

三、70年代、8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一) 国际环境的新特点

1、 世界政治多极化

2、 世界经济国际化

3、 美苏实力的均衡

4、 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新认识

1、 党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

2、 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 党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1、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2、 我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特点

结束语

5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环境与党的经济发展战略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完成这一宏伟而又艰巨的任务，向人民指明奋斗目标，党就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党对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因素充分估量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国情的主要方面；同时，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环境也是国情之一。国际环境以及党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分析，也是党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因此，研究党的每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判断对党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无借鉴意义。

一、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与“赶超战略”

1957年，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是“赶超战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

原因。

(一) 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

50年代中后期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依然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各有特点。

1、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

50年代中后期，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斗争仍然是以“冷战”[1]的形式展开的。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阵营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幌子，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加紧对亚非拉地区的争夺和控制。对新建立的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进行颠覆和破坏，妄想恢复旧的、反动势力的统治。社会主义阵营高举和平、民主的大旗，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倡导发动了席卷世界的和平运动，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经济上，两大阵营的斗争表现为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帝国主义妄图以经济封锁的手段来扼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坚决的、反封锁的斗争。它们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努力探寻和扩大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贸易。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各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坚

决斗争。

在军事上，帝国主义阵营在美国的策划下拼凑了一系列的军事条约组织，以封锁和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拼凑了“北大西洋军事集团”，[2]千方百计地复活西德复仇势力。朝鲜战争后，美国又极力拼凑了“太平洋军事集团”，[3]进行战争叫嚣。这样，美国终于拼凑成了一个从北大西洋，经过西欧、地中海、中东、东南亚到东北亚的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包围圈。同时，美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冒险，向社会主义阵营挑衅。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在两大阵营的对待与斗争日趋激烈这样一种紧张、动荡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进行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的。

2、美苏与中国的关系

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子，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其政策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怎样，无疑也是中国领导人决策时应考虑的因素之一。

(1)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

美国在侵朝战争惨败后，便积极推行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4]，策划建立包围中国的军事条约网。1954年9月，美国纠集英、法、澳等国拼凑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其矛头主要针对中国。同时，美国加紧在台湾地区

的侵略活动。1954年12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争条约。美国的目的是长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填补其战略“空档”，进而纠集台湾、南朝鲜和日本组成“东北亚防务联盟”，并同东南亚防务集团相联系，建立完整的“围堵防线”，威胁中国。

1958年7月，美国在入侵黎巴嫩的同时，还支持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战争挑衅。8月，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狂妄地叫嚣，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登陆。[5]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进行还击之后，美国竟然调集包括6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舰只和数百架飞机及几千名作战部队到台湾海峡地区，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海岛屿的斗争。

在政治上，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采取不承认政策，并且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但是，当新中国作为坚决的反帝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美国又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海岛屿军事行动的展开，美国政府出现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和做法。从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就是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总方针的。

在经济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

整个50年代，美国把遏制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把中国看成是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敌手。

(2) 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总的来说，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友好合作时期，但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此外，中苏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也开始出现。这表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中苏两党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重大问题上，中苏两党存在着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片面强调“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等。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帝国主义趁机在全世界掀起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浪潮。

1956年4月和1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谎言时，对斯大林的一生作出了全面的分析。文章还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包括苏共对斯大林的作法。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

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主要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在苏共代表团原来提出的《莫斯科宣言》(草案)中,塞进了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中共代表团反对苏共代表团的这种错误提法,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了必要和适当的斗争。中共代表团通过同苏共领导人进行充分协商和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反复交换意见,同时为了顾全和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在某些方面也作了一定的让步,对原草案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会议最后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有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道路;二是在讲到取得“议会多数”时,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

此外,到了1958年,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矛盾也开始出现了。这一年4月、7月,苏联连续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两项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

(二) 党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及“赶超战略”的提出

5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应当怎样进行经济建设,这都需要党对国际环境进行准确的估量,据此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1、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与抢时间建设

说到“赶超战略”造成的失误时,人们更多地说,是

由于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导致的。但是为何要“急”，为何要“赶”、要“超”，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和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环境，就大的方面而言，要么是战争环境，要么是和平环境。国家的决策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直接影响着大政方针、内外政策的确定，当然也影响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可以制止，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更侧重于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有可能不久发生。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准备出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6]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会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7]所以，“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8]

根据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观点，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曾认为，和平建设时间是有限的、暂时的，战争终究会打起来。1956年1月，毛泽东说：“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

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12年时间，来基本完成工业化呢？”[9]同年6月，毛泽东估计到“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10]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和平建设时间只有10年或者12年呢？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共经过21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过去10年，”[11]再过10年或者12年正好是二十一、二年，和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正好相等，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了。因此，和平建设时间只是暂时的，再过10年或者12年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1958年6月，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说：“要争取时间最好10年不打仗，1918—1939，有21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21年算，还有8年”。[12]可见，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对和平建设的时间、战争爆发的时间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来推算的。

既然认为战争在不久的将来终归要发生，和平建设时间只是暂时的，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加快建设步伐，抢时间，争速度，力争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未爆发前就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完成工业化，积聚雄厚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要“赶超”的深层原因。

还要指出的是，对10年、12年的和平建设时间，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曾认为并未完全有把握。1955年3月，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

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3]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今后12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14]因此，党对形势还有另外一种估计：帝国主义有可能随时冒险，发动突然袭击，有可能在我们估计的10年、12年内发动战争，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尽快、尽速建设好国家，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随时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在“赶超战略”提出后赶超的时间一再提前的原因。

2、“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与改变落后面貌、增强国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5]的确，1957年下半年前后在两大阵营的对待与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取得了些优势。在莫斯科会议之前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曾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最初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了全世界。随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齐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共商国际共运的大计。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倡导的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

积极支持等等，也赢得了世人的称赞。这说明，就政治力量而言，社会主义阵营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但在经济发展、物质力量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并未占有明显的优势。

50年代是资本主义各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由科学技术进步促成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迅速兴起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原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这些部门生产的迅速发展，又形成了象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整个50、6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束缚，这些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上，一般都是片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结果造成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引起群众的不满。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此外，社会主义各国大都是从原来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的起点上搞建设的，要改变落后面貌，还尚需时日。仅就1957年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来说，社会主义阵营仅占33%，而资本主义体系却占67%。[16]这说明，两大阵营经济上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我国工业总

产值为704亿元，人均产值为109元。人均国民收入，1957年，美国为2331美元，苏联为612美元，法国为1304美元，中国为53美元，[17]相差十分悬殊。

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在精神、真理、正义方面，在政治力量方面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但在经济实力、物质力量方面远逊于帝国主义阵营。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在两大阵营对待与斗争、帝国主义不断向社会主义阵营挑衅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尽速把经济搞上去，以此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有效地遏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莫斯科会议之前，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其他东欧国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竞赛对象。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快增强实力，争取主动。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人口最多的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但在经济方面还很落后。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改善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因此，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就考虑，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以此来增强实力，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改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否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